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李舜华 著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以章回小说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来的传统白话长篇小说，自晚清民初以来已逐渐为学界内外所认同；除白话与长篇以外，其体制特征基本有四：其一，分回标目；其二，起结的模式化；其三，以散文为主，以韵文为辅的叙事语言；其四，说书人的叙述口吻。这四者都属于章回小说最外在的形式特征，不过，却是区别于西方所谓长篇小说最明显的标志，因此，当晚清民初的学人试图以西例观照中国小说时，便不约而同地假此来界分章回小说并加以评述。然而，确切而言，章回小说这一概念的界定，或者说，人们对其文体本质的认识，恐怕还有待于在与其他文体的不断界分中进一步深化。



667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41

221

KD00958667

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李舜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李舜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9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265 - 7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5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李舜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3 字数 400,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325 - 6265 - 7

I · 2457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自序

本书是我于1997年至2000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所撰博士论文的修订稿。自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所作博士后以来，一直转攻戏曲，待2006年将原出站报告（即《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出版后，方才重返小说研究。时隔七八年，似乎有很多思考都变得零零落落了。

我阅读小说甚早，大抵僻居山城，有什么看什么，当时接触得多的倒是晚清与后来的小说，以白话为多。记得亦是十岁左右，即金圣叹以为可以读《水浒》的年龄，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秦瘦鸥的《秋海棠》。至于明清白话作品，除十余岁时酷嗜《红楼梦》外，四大名著的其他三种亦只是随手翻翻罢了，看得多的反而是文言小说与弹词之属。如今想来，当时对创作旧体诗词的痴迷，竟是由这些说部而来，影响最深的便是《红楼梦》、《花月痕》及张恨水的《春明外史》；而少年旧体诗作格律不谨，其实倒是拜这一“入门不正”所赐。大学期间，虽然身在历史系，却有些不务正业，大约远离故土，穷极无聊，学业之余，便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内凡能搜罗到的明清说部，无论话本、章回、弹词、戏曲、文言，都做了枕前饭后的消遣。然而，亦只是消遣而已。更多的日子还是留给了图书馆的乱翻书，还有静静地望了天空，写一些花开花谢、云飞云落的文字。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冬眠，那魂魄深处所有的悸动都已遗落在梦底，遗落在数千里烟水外的故园。考研的时候，记得是颇为踌躇了一番的。最后决定报考元明清段，以小说为主，心里想着，那摇曳无穷的诗词，妍媚一如江南的莲，还是留做一份不染的性情罢。就这样，背着一肩行囊来到了落日晨钟里的老北京。

踏进北师大，原本单纯的读书世界似乎一下子喧哗起来，校园里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年轻的学子一开口似乎都能冒出一些新名词，用谁谁的话说，在曾经的日子里，随便在哪一条小径上走过，都能看到学生们匆匆地来去，腋下夹着一本弗洛伊德的书，然后海德格尔、拉康、罗兰·巴特、德里达，而海子的诗似乎也并没有完全地沉寂，或许迟来的我们，仍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八十年代末北京空气里的躁动。如果说八十年代西学的繁荣，沉淀着一种精神上的渴求；那么，九十年代中期，铺天盖地的西方理

论就仿佛迷失了方向的音乐,这家才罢,那家又起。所有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只是赶了一个尾声,新理论、新诗歌、摇滚、小剧场、第某代电影……于是,在四处逐梦的时候便莫名有了一份缅怀的心境,激情与迷惘似乎总是同时在生活的边缘行走(有时候想,当年青木正儿撰写《明清戏曲史》来中国追寻昆腔京韵的遗声遗影,或许也是这种心态罢,那么,一代民国学人呢?)也许应该庆幸自己生长江南,那草长莺飞、杂花生树里的诵读早已煨成了古典的胚子。于是,对我而言,无论多么喧哗的理论都不过是同一生命在不同阶段下的不同叙述,是同一历史长河里不同河汊的人生歌哭;它们的意义,恰恰在于丰富了我们站在现代界标上重观古典的思考。也许,研究者只是人生最艰难的跋涉者,他总是试图穿越种种复杂的历史镜像,重返本初,一如蒹葭苍苍里的游子,只有用最本真的心,百折而不悔,或能一接伊人的容光。

尽管自北上求学以来,几乎读尽了明清说部;然而,少年时期浸淫于骨髓的只是一部《红楼梦》。这一部书足以让你在追溯整部明清小说史时具有异乎寻常的穿透力:为什么胡适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之为文艺复兴,并以为新文学之实质,即复兴以《水浒》、《红楼》等为代表的白话文学传统?为什么郑振铎在肯定小说戏曲是近世文学之时,特别拈出一句,因为它们最能贴近我们现代人的灵魂?为什么自五四以来,在西方视野的参照下,关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批评——围绕着是否具有近代意义——便有种种令人诧异的争论?为什么“现(近)代化”本身,无论在文学、历史、思想诸领域,都成了最具诱惑,又最难以解说的困境?由当下而上溯五四,而清,而晚明,最后我将目光锁定在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年。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是有明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史变动最为剧烈的时代,以文人士夫为核心,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几乎每一个个体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心灵裂变。不同的性命取向最终滋生出不同的文学取向。随着文人士夫师道精神的高涨与消解,各种文体,自诗文而戏曲而小说,依次而下,几乎都经历了一场由复古到性灵的折变,而异彩纷呈。也许只是一种说不清的直觉,总以为嘉靖万历年间文人士夫的逐梦心态,与八十年代新时期的文化重溯颇有相似之处,两者最终都堕入了以师道自任(启蒙?)而不能的荒诞之中。陈晓明曾如此评论八十年代后期的年青作家(晚生代),他们“承受了这个‘前提’(新时期)的全部压力而仓惶逃亡”。^①也许,万历三十年,李贽之死标志了一个精英时代的结束,对袁宏道等人而言,“鼓吹性灵”也不

^① 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过是仓皇逃亡后一种心灵的润滑。而袁宏道之后，种种所谓个性的恣放，更不过是一场世俗的欢宴——在集体的狂欢里，自我、真我日益迷失。如此，站在十九世纪末的历史坐标上，重新回溯明代中叶文字里的梦生梦灭，便有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苍凉，相应，对五四以来一直标举的晚明精神，也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疏离。

如今，重新捧读这份论文，确有百感交集的意味。如上所述，当初留意章回小说的发生，究其根本，实在于一种生命体认，并由此拓至对中西不同文化的体悟，故整篇论文虽撰写艰难，但成文后却似一气呵成，其中气韵已非今日之我所能着笔，尤其是下半部关于文本解读的部分。迄今为止，这部分内容仍然是我对兴起时章回小说最好的诠释（尽管在当时，我曾一次次因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内心的体会而颇为沮丧，至今犹然）。今日之我，学理渐长，激情渐退，要做如此文字反而不易了，或许生命的体认，永远是无法言说的。然而，不得不检讨的是，对文本的解读只是以一种文学的直感——其根本则源于一种对生命的切肤体验（包括西方在内，种种有关文学形式的批评亦不过解读的途径而已）——来把握一代精神的内核，然而在如何诠释上却困难重重。因此，本书的上半部更多地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关于章回小说近代意义之种种争议的反思，驳多于立，所辨析的（章回）小说的概念、两类读者说（“文人”与“庶民”）、女性读者影响论，以及重申明人批评后提出的两类传统说（“小说”与“演义”）等，在当时都未能联系历史情境进一步深化。为什么兴起时的章回小说在建构历史的同时，其飞扬的（近世？）精神迅速隳沉？为什么金元、晚明、五四，甚至而今，中国文学的近（现）代会如此一波三折？天地何其大，人身何其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每一个体究竟该何去何从？百思千虑，终不得其解，以至于论文完成后，我一度极为消沉。我只是明白一点，要理解并反思晚明精神，不仅要重释明代中期文学复兴之初，还得理清明代前期所谓的文学沉寂，如此，金元以来文学新精神何以受挫、明弘正之后又何以复兴方能有更为逻辑的阐释。正是因此，我选择了明前中期作为自己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而且切入对象是戏曲。初定选题后的自己，长期堕于一种惘然。两年之内，在一块几近荒芜、于自己又全然陌生的土地上耕耘，这其间的艰辛非言语所能道。只待若干年后，特拈出“礼乐”二字，并以此为焦点，从制度与精神两端来切入明前中期演剧之变迁，方稍稍有了一种破茧后的自由。

不过，尽管当年的种种困惑已渐次清晰，但这次出版并没有做太大的修订。正文，尤其是后半部文本解读部分，除因出版字数限制做过若干删改，并重新核对引文外，基本保持原貌，另外，第二章内还插入了一篇当时

撰写的关于“小说价格”的论文。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保持全书风格的统一,既包括叙述对象的相似,也包括叙述方式及语言的相似。最大的改动是将原来论文绪论部分的第二节,“小说”的释义,实为研究史的评述,易为本书第一章,并将原绪论部分的第一节与原有余论部分合并,由此扩充,重新撰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置于全书之首。在这篇新绪论中,重新概述了正文的主要观点,并隐括了笔者一年来对章回小说之兴起的种种思考,主要分三部分,第一,从概念上重新辨析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兴起及兴起时章回小说的内涵及意义,包括文体意义与精神史意义。第二,进一步联系明代的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背景,更为系统地辨析章回小说两类传统说(“小说”与“演义”)与女性读者影响论的实质,而这正是我们理解章回小说何以兴起的关键所在。第三,简要说明在新的理论情境下,如何体现内容与形式一体化,以重新阐释章回小说的文体意义,并由此切入小说文本的批评,并与有明精神史的变迁相联系。概言之,一种新文体的发生,其意义首先在于形式之新,究其根本,则在于这一“新形式的发生”所寄寓的精神内涵,前者是“文学的自觉”,后者则是“人的自觉”;因此,明确章回小说的文体意义,正是我们解读兴起时章回小说精神所寄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理清种种纷繁历史事相的关键途径。略可安慰的是,这一篇新绪论已不仅仅是对当年博士论文的一次总结与提升,也将是我重新考察传统小说史,并进一步将之纳入史学与经学视野,以还原中国小说自身理论的开始。

另外,关于本书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一是所谓“近世”,与此相关的语汇有“近代(性)”、“现代(性)”等。尽管目前,对近世文学的分期及近世文学本身这一概念,笔者始终以为需要审慎对待,然而,这一场纠结百年,而且可能还会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的“近世”议题,却始终是我们文学史研究所无法回避的思考。或许,不是“近世”不能提,而是如何提的问题。二是所谓“市民”。自二十世纪以来,“市民”这一概念,与“近世”相似,已染有相当的西方色彩。在目前,当“近世”尚无法作确切阐释的时候,本书所用“市民”,只能谨慎地定为“市井细民”的简称。

由于这本书,我的学生生涯总算画了一个句号,尽管这也不过是以后更为漫长的求学生涯的开始。悄然回首,颇为感谢那些在生命中曾给我以种种教诲与帮助的人。在京六年,除本师张俊先生之外,我还有幸聆听过郭英德先生、于天池先生、罗钢先生、李道英先生、赵仁圭先生、韩兆琦先生等的课程,受益不少。论文完成后,又蒙北京大学侯忠义先生,陈熙中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段启明先生与本校聂石樵先生、郭英德先生、于天池先

生,以及《文学遗产》杂志社竺青先生等,在评阅答辩过程中,提出不少中肯意见,对此深表谢意。

博士论文成稿后,此后的修订或断或续,历时甚长,复辗转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故于资料校核方面颇有不便。此番最后修订,得学生余伟英、郑更妙将全部引文重加核定,费时甚巨;余素来简淡,不耐繁剧,二位女弟校核之细实胜于我,由于种种原因,仍难免讹误之处,自当由我一力负责。复旦大学查屏球先生、罗书华先生、南京大学苗怀明先生、浙江大学徐永明先生、广州大学纪德君先生曾费心代为复印、传送或借阅相关资料,一并致谢。

另外,这部书稿不少已在《浙江学刊》、《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北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上海)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北方论丛》等期刊发表,可以说,笔者在研究道路上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期刊编辑的鼓励与支持,在此亦深表谢意。所有文章,或是最初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大致同题)的部分章节、或是读博期间的阶段性文章、或是博士论文写成后的整理稿,均发表有年,有关文字与论点,自以此部书稿为准。

最后尚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得以完成,最应感谢两位多年来对我谆谆教诲的师长,北京师范大学的张俊师与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师。在我意中,原是极想请两位老师为本书作序,希望聆听到老师更多的建议与鼓励。只是近一年来,两位老师身体都有待静养,实不敢再因此事去劳烦他们,唯缀此数语以申敬意而已。

李舜华

戊子年初夏于粤秀峰外

此序原作于零八年,倏忽四载有余。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自昔已然。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章培恒师竟于去岁遽归道山,此生是无缘再听到他的批评了。染翰泫然,瞻顾何极。

壬辰六月补记于台大鹿鸣雅舍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一、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1
二、关于章回小说两类传统的辨析	16
三、关于章回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批评	29
第一章 “小说”释义	44
引子 历史上的正统小说观与口头小说观	45
一、“小说”与“演义”	47
二、“白话”与“长篇(章回)”	53
三、“传统”与“近代”	61
第二章 “文人”与“庶民”：读者群与章回小说的兴起	64
第一节 “价格昂贵说”与“文人接受说”献疑	67
一、从其他书价看小说的价格	68
二、从物价与收入看小说的价格	70
三、关于小说价格本身的疑问	72
四、从图书馆、租书、抄书等因素来看小说的价格	74
第二节 两类读者与两类小说	77
一、宫廷贵族——乱自上作	79
二、文人——假小说以发愤	81
三、书商——庶民教育与梓者纷纷	84
第三节 女性读者与章回小说的兴起	89
一、女性阅读的兴起	89

2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二、明代女教思想的变迁	94
三、“女性读者影响章回小说兴起论”献疑	101
第三章 “文人”与“书商”：小说批评中史与警、雅与俗的分野	105
第一节 文人：“发愤说”中小说文体意义的发现	105
一、从娱乐到发愤——作者的发现	106
二、“小说”的正名——小说文体意义的发现	109
第二节 书商：“教化说”中小说文体意义的发现	117
一、“演义”的定义与起于史书说	118
二、虚实辨——小说对史书的突破	119
三、教化辨——传播史识、惩恶劝善与历史反思	121
第三节 复古与性灵、激进与渐进：小说演进的两条径路	125
一、扬《水浒》而薄《三国》	125
二、“发愤(娱乐)”与“教化”新解	128
第四章 从追求到幻灭：“市民”眼中的历史舞台与英雄传说(上)	137
第一节 乱世传奇中的史诗因素	139
第二节 “说铁骑儿”与市井细民发迹变泰的欲望	157
一、“说铁骑儿”与早期章回小说的叙述结构	157
二、发迹变泰：从边廷立功到角逐天下	160
第五章 从追求到幻灭：“市民”眼中的历史舞台与英雄传说(下)	167
第三节 历史舞台上的“理性”因素	167
一、儒家理性意识的渗入	167
二、天人相争——“理性”的悲剧之一	171
三、君臣矛盾——“理性”的悲剧之二	175
四、历史循环后的空幻感	178
五、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181
第四节 历史秩序的建构与消解	186

一、书商小说系列：历史向传奇倾斜·····	187
二、文人小说系列：从历史烟云到市井风情·····	198
第六章 从湮没到喧哗：男性视野中女性的突围 ·····	211
第一节 历史传奇：女性形象的空前失落·····	213
第二节 绣阁欢爱与江湖叛逆：作为辅助与潜在对抗的女性群 ·····	217
一、江湖与绣阁·····	218
二、同在江湖上·····	223
第三节 文人与市民：不同视野中的女性·····	230
一、历史传奇中女性寓言的精致化·····	231
二、神魔与世情中女性的突围·····	236
主要参考书目 ·····	245
附录一 ·····	262
从历史传奇到儿女真情：重构《红楼梦》的四个世界·····	262
一、荣宁府外：《石头记》，历史的消解·····	262
二、荣宁两府（大观园外）：《风月宝鉴》，或隐或现的绣阁欢爱 ·····	266
三、大观园内：《金陵十二钗》，大旨谈情·····	268
四、太虚幻境：《红楼梦》，空而不空的寓言·····	271
附录二 ·····	274
“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对明以来迄晚清民初性别书写的 重新思考·····	274
后记 ·····	287
补记 ·····	290

绪 论

一、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本书研究的题目为“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具体而言，实际包括三层内涵，即“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兴起”及“兴起时期的章回小说”。有关这三者，似乎仍有若干问题不得不稍加说明^①：

一、章回小说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形式，以章回小说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来的传统白话长篇小说，自晚清民初以来已逐渐为学界内外所认同；除白话与长篇以外，其体制特征基本有四：其一，分回（则）标目；其二，起结的模式化；其三，以散文为主、以韵文为辅的叙事语言；其四，说书人的叙述口吻^②。这四者都属于章回小说最外在的形式特征，不过，却是区别于西方所谓长篇小说最明显的标志，因此，当晚清民初的学人试图以西例观照中国小说时，便不约而同地假此来界分章回小说并加以评述。然而，确切而言，章回小说这一概念的界定，或者说，人们对其文体本质的认识，恐怕还有待于在与其他文体的不断界分中进一步深化。

晚清民初，当人们一开始提及“章回小说”时，首先注意到小说分章分回等体制特征，并以为这些特征直接渊源于宋元说话，故而多称《宣和遗

①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综述20世纪的小说理论时，特别提到，自本世纪初以来，“小说的定义”与“小说的历史”常常处于一种争论之中。可以说，不同的理论范式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定义及其对小说历史的描述，而这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基本可以判为两类，一类强调形式，一类强调题材与内容；那么，重新定义小说及其历史，也正是基于对内容与形式的重新理解之上。下文对章回小说的定义及其历史的描述，也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② 历来对章回小说的定义，无论繁简都颇为笼统，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1986年）“章回小说”条，仅称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具”；而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解释虽详，主要也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情节繁复、内容通俗、语言晓畅、文备众体、模拟说话艺术形式为主要特征”，并称其由宋元长篇说话嬗变而来，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与笔记、传奇、白话短篇分途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所述实涉及章回小说的渊源、体制特征、叙述艺术及其文学史意义等等。第15页。本书所列四点特征主要就章回体的叙述体制而言，基本是根据各家关于章回小说的论述概括而来，先列于前以示大概而已，具体为章回小说所下定义尚待下文。

事》、《五代史平话》等为章回之祖^①，甚至将明清章回小说与宋元话本并称白话体（章回体），而与文言体（包括笔记体与传奇体）、韵文体（包括戏曲体与弹词体）并立，都视为小说内部的子类；直到后来，方逐渐剔除韵文体，而确立“笔记——传奇——话本——章回”这一小说谱系，前二者以文言为主，后二者以白话为主，遂并列为传统小说两大支派^②。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后者自明以后蔚然大兴，且与近现代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多被视为小说的正宗^③。这样一种小说文体的子类划分，百年来直接影响了对小说目录学及小说史的纂写；不过，细究起来，这一谱系却突出了章回与话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甚至在西方批评视野的参照下，复有通俗小说、白话小说、长篇小说种种称谓，或专指章回，或兼指话本与章回，“章回”这一称谓及其话本渊源也由此逐渐蒙上了一层贬损色彩^④，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对章回小说的文体形式及意义仍有所不明。

与此相对，一些研究者明确提出，“章回”这一体制，于话本之外别有渊源，即史传。对这一渊源的追溯，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早期的以《史记》为代表之纪传体史书说，一是后来的以《资治通鉴》为代表之纲目体史书说。例如，当蒲安迪标举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时，曾明确反对五四以来通俗文学说（即强调小说的说话渊源）的主流诠释，而重申李贽、金圣叹等

① 参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7页。

② 其实，早在1903年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署名别士）就试图将明清章回小说与曲本弹词区别开来，而初步勾勒了传奇之外章回的发生。不过，在一开始，小说研究基本沿袭传统目录学的分类法，将韵文体一同纳入小说概念的范畴。譬如，管达如《小说小话》（1912）即将小说分为文言体、白话体、韵文体，并以白话体为正宗，指出白话多用章回体，亦犹文言多用笔记体，甚至以为凡用白话及弹词体之小说多属章回，即传奇也属此类。这其实是将白话体与韵文体俱列入章回体。天僊生《中国历代小说的变迁》（1907）亦将小说分为记事体（即传奇体）、杂记体（即笔记体）、戏剧体、章回体、弹词体。参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6、398—399页。直到1937年，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始剔除弹词、传奇于章回之外，而将章回体与笔记体、传奇体、白话体并列。参上书吴福辉所编第三卷，第466页。

③ 也正是因此，自晚清民初起，研究者在谈及章回小说时，无论是褒是贬，几乎都是以西方近现代小说 novel 作参照的，近年海外汉学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来重申章回小说，亦试图将其纳入 novel 这一文体概念，视为 novel 在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变体。

④ 早在民初，即有论者对章回体颇有非议。真正注意到章回小说在文体上的革新意义，并为之正名，这一努力实始于西方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蒲安迪（Andrew H. Plaks）。在蒲氏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中，特别将四大奇书命名为文人小说，指出原有的渊源于说话的叙述格局，实已经过文人反讽式处理，而成为“奇书”这一新文体独特的叙述结构。蒲氏之说在西方汉学界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在国内尽管已有人撰文介绍，而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也明显受到蒲氏的影响，但继起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部地探讨小说的叙述艺术，如结构、视角种种，而于章回体的革新意义却始终未有进一步的发明。

人的经、史、子杂源说,甚至勾勒了“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这一叙事文的发展途径,以与西方“epic—romance—novel”这一谱系相比较。不过,蒲氏侧重于从文本细读的方式来建构奇书系统,因此,更多地是在叙述的体例、笔法、视角、母题等方面肯定了章回小说的(纪传体)“史文”渊源,且具体论述也还有些笼统^①。近年来,关于章回形成史上纲目体史书意义的辨析渐趋细致,有关研究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于“章回体”这一概念的理解,譬如章回小说是以“则”分还是以“回”分,“则”与“回”之间如何变化,与小说题材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如何韵文相对减少并增入大量奏折、诏令、史赞之类,以及史官的叙述口吻,等等^②。然而,形式与内容是无法分割的,一种新文体的生成,绝不仅仅止于形式之新,究其根本实在于这一“新形式的发生”所隐喻的精神内涵^③。其实,渊源于史传纲目的章回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三国》为代表的(按鉴)演义体,至于《水浒》,就目前版本来看,自一开始即以回标目,显然与说话渊源更深。然而,《水浒》也自有其史传渊源。上述蒲安迪有关奇书文体史文渊源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即来自于明清人、尤其是金圣叹对《水浒》的文法理解。的确,当《水浒》一刊行时,即常常被誉为小说中的《史记》,那么,个中原因何在呢?最早,嘉靖时李开先等人曾如此惊叹,“《水浒传》叙述委曲、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一笑散·时调》)。李开先等人将《水浒》与《史记》并提,根本就在于二者都“叙述委曲、血脉贯通”。何以如此呢?稍后,李贽等人进一步将个中原因归结于作者的发愤写心;换言之,《水浒》与《史记》的相通,根本在于创作精神及其所产生的高超的艺术效果上。由此来看,当《水浒》刚刚开始流传时,人们首先关注到的并不是小说种种渊源于说话的形式特征,而是小说的叙事肌理及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而“叙事”正是小说最典型的文体特征。

那么,从内在的叙事肌理与叙事精神,而非外在的形式特征,来肯定小说与史传的源流关系,其意义又是什么呢?

议及于此,却不得不提及“章回”的另一渊源“传奇”(包括唐之小说与明之戏曲)。章回小说与明传奇在体制上的相似,亦曾为人提及^④,不过,

①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3、30、29页。

② 参见纪德君《从历史演义看古代小说章回体式的形成原因与成熟过程》,《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罗书华《章回小说之“章回”考察》,《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

③ 需要提出的是,这一精神内涵与小说所表达的内容,或称内在精神,虽密切相关,却也并不完全等同。

④ 但却很少有人专门论述章回的发生与明传奇的关联,这显然是由于二者大致形成于同一时代,彼此在体制上如何互为影响实颇为复杂的缘故。

此处特拈出“章回与传奇”所关注的却并非外在的体制特征。不妨先从章回与唐传奇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自明清以来一直到民初不断为人提及,却始终只是一种感性的比拟,个中真义往往语焉不详。譬如,1903年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道:“唐人《霍小玉传》、《步非烟》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衍出者为《水浒传》,由《水浒传》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备,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也。”以上是目前最早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梳理章回小说发生的论述。细味其语,其实质恰恰在于肯定了唐传奇与章回之间在叙述手法上的相似,“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所谓“章回”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①。这一说法与明李开先等人以《史记》称誉《水浒》的议论颇为相似。同样,当明人纷纷以唐之“传奇”指称章回小说时,其实也在肯定二者如何都幻设为文、叙述委曲,以及作者的游戏笔墨^②。问题是,这一叙述手法的相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唐传奇幻设为文,叙述宛转而文辞华艳,遂迥异于旧小说(笔记体),“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并援引胡应麟语以为印证,“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③。可以说,正是“作意好奇”最终标志了传奇体的确立(迥异于旧小说),而“唐人假小说以寄笔端”则是“作意好奇”的根本内核;换言之,文人自觉介入小说的创作,并假此以自我寄寓,是传奇体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其实质是传奇体“文学性”的彰显。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唐传奇的确立最终标志了文言小说的文体独立^④。如此看来,前人不自觉地强调章回小说与唐传奇在幻设为文、叙述委曲等方面的相似,同样也暗示了章回体的真正形成及其文学性的彰显与文人精神,尤其是个体精神的注入直接相关。至于李开先、李贽等人为何以《史记》来称誉《水浒》,其意义也只有从这一层面切入才能真正理解。

一旦发明此意,长期以来小说批评领域种种文体概念,尤其是章回小

-
- ① 如此,不仅别士,早期论及章回小说的,如邹弢、管达如、黄人等,几乎都特别注意到了章回小说的叙事魅力。其中,管氏《小说小话》亦正是从篇幅之长、叙述委曲、描写入微等特点来界分章回体与笔记体,并由此认同了章回小说与传奇、弹词等在叙述上的相通,指出“凡用白话及弹词体小说多属此种,即传奇亦属此类”。
- ② 刘晓军亦约略提及明清人何以借“(唐)传奇”指称章回小说,参其《“章回体”称谓考》,《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4页。
- ④ 关于唐传奇文体独立的意义,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与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也有讨论。

说与明清传奇及其他韵文体之间的模糊与混杂似乎也能得到某种诠释。晚清民初往往视韵文体(包括曲体与弹词体)为小说的子类,明人即以传奇指称南曲戏文,复以指称小说(包括章回与拟话本),显然著意的都在于这一叙述精神上的相通,而暗示了对文人有意而作及因此产生的艺术效果的肯定。也正是由这一意义推衍,我们说,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与传奇的兴起不过是同一背景下的两个分支,二者都不过是文人参与下,原有平话或戏文(而二者又均可以溯源至民间说唱)从内在意蕴到外在形式俱已发生质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这也是章回体制与(明)传奇体制最为相似的根本原因,只是二者并非源流关系,不过同源而异流、又互为影响罢了^①。至于后来的弹词,与章回小说更为相似,二者几乎都可以归入传统长篇白话小说,只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文罢了^②。

“章回小说”的正式命名始于晚清民初,在明代,自嘉靖间《三国》、《水浒》刊行以来,时人的种种称谓却颇为繁复,譬如“平/词话”、“(通俗)演义”、“(志)传”、“小说”、“传奇”种种,而且几乎每一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处于不断的变动过程中,究其实质,却都暗示了章回小说与话本、史传、传奇间从形式到精神上的种种关联。此后的“奇书”、“才子书”不过由“传奇”之“奇”衍出,而传达出时人对章回小说在文人(所谓“才子”者)参与下逐渐独立,其叙述艺术复有种种新奇淫诡的惊叹;因此,这一“奇书”、“才子书”亦可以说是章回体的子门类,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章回体的日趋完善^③。从平话到演义、小说、传奇,这种种称谓的纷纭,不仅透露出章回小说这一新文体“文备众体”的特征——大抵平话、史传一近一远,皆为其根本,(唐)传奇为其肌理,诗词为其花叶,而剧曲、弹词为其旁脉而已,这才是别士惊呼“六艺附庸,蔚为大备”的真义——更折射出整个命名过程(实即章回小说发生之历程)中所蕴精神内涵的复杂,而其间,文人个体精神的注入适为其关键^④。

-
- ① 关于戏曲中传奇体确立的复杂性,可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正是在强调文体确立与文人的关联,明清传奇复往往以文人传奇为主体,而浦安迪也特别强调长篇白话小说中的“奇书体”,视之为与明清文人传奇、文人画同出一源的文人小说。参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 ② 这里所说的“白话”亦包括相对浅近的近世语体,而非纯粹的白话。弹词虽然所用的仍然是为整齐的诗体,但是格律比较自由,文字也相对浅近,说它也可归入白话小说也正是从这一语体的近世化而言的。
- ③ 后来,“奇书”、“才子书”的运用日益俗化,多不过作者或书贾互相标榜亦自我标榜的结果。
- ④ 这一个体精神的内涵仍然有着多层次的丰富内涵。譬如,李贽论《水浒》所说的发愤写心,鲁迅论唐传奇所说的“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二者都可以涵括在内,然而,彼此之异同,相互之关联,及其意义之变迁,都极为复杂。有关论述参下文。

需要提出的是,即使在确立之后,章回小说与话本,就外在体制而言亦无严格区分;相反,作为文本形式的话本,兴于章回之后,当文人参与话本的修订时,明显受到章回小说的影响,因此,二者之别不过篇幅长短而已。这也是至民国之时,章回体仍可兼称长(短)篇白话小说的缘故。然而,于笔者而言,话本不过徒得章回之表,于叙述的内在肌理及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却颇为逊色,其回目的种种争奇斗异,也不过编撰者逞才游艺的结果罢了^①。总而言之,章回体,特指原有史传与小说(平话),在相互交融的基础上,从内在意蕴到外在形式俱已发生质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体,其中章回这一体制亦最终成为文人寄寓自我精神(并最终折射一代精神)的一种叙述结构,所谓分章(回)标目、散韵结合、开篇收尾、楔子有无,甚至于类似说话人的叙述格局等等,都不过是外在的体式而已,后者只有在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手法进入小说的寓意架构时,才能真正发挥所谓章回的体制意义。

尽管就字面而言,“章回”二字提示的仅仅是最外在的形式的特征,然而,通过对这一形式的分析及其渊源的追溯,正可以整体把握这一新文体发生、发展的历程,是如何文备众体,又如何折射了一代精神史的剧烈变动。笔者在本书中,特别拈出章回小说这一概念,而非通俗小说、文人小说、传统白话长篇小说、奇书、才子书、演义等等,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相比较,其他概念显然所指向的文化内涵都未免有些单一。

二、章回小说的兴起

章回小说兴起于何时?一般以为,《三国》、《水浒》为章回之始^②;然而,相应而来的问题是,这两部小说究竟成书于何时,元,明初,明中叶?由于目前所知与所见的版本及相关记载,其上限似乎都止于明代嘉靖年间^③;因此,近些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元代说、元末明初说^④,而

① 关于万历以后,话本小说的章回化,可参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早期有学者上追两宋,如胡适称“宋为章回小说的发生期”,大抵因混同话本与章回而来,此一点可撇开不论。

③ 这一时间最多略可上溯至弘正间,如《三国演义》并有弘治七年序,而今存《京本忠义传》残页,亦有学者断定为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参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不过,在明代的书目著录中尚未发现任何一种早于嘉靖元年的刊本,而从有关议论来看,旧本的流传其实是极为少见的,“嘉靖壬午”序所称“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其实很难断定始自何时。

④ 以《三国演义》为例,在80年代伊始,持元代中后期说者,以章培恒与袁世硕为代表。章先生以为“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参其《〈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袁氏则以为在14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参其《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